

人民是母亲

刘备耕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人民是母亲

刘备耕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是母亲/刘备耕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10
ISBN 7-80199-336-5
I. 人... II 刘... III. 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648 号

书 名:人民是母亲

作 者:刘备耕
责任编辑:陈红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 0371-67811562
开 本:32 开 850×1168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5.125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336-5/K.267

定 价:28.00 元

居報應後反財
部隊的生動事
實，求為教育
的有力武器。

所小平

十月革命節

勝如以來之奇必須
越其結合羣衆機
要頑強進行鬥爭

我均重報別刊

劉伯承敬祝一九四三年

序

(一)

书的作者刘备耕同志，是位长我四岁的耄耋老人，是同我相交已六十多年的好友。

抗战初期，日军长驱直入，气焰十分嚣张，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北平、天津和太原，华北大部沦陷。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八路军以敌进我进的大无畏精神，深入敌后光复广大农村，129师奉命依托太行山创建根据地，备耕同志就在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1939年，我从抗大毕业在总部警卫团工作了一段，被调到129师385旅，先后在宣传队、青年队当教员，和他正好是一个系统上下属的关系，便互相认识了。我从小爱好文学，听说他是延安鲁艺文学系来的，很愿意同他交往。我们都是南方人（他福建我安徽），而家都住在上海，也都在上海念过书，可聊的话题很多，谈得特别起劲。国难当头，民心激昂，知识青年更不愿当亡国奴，纷纷自愿参加抗日。八路军兵叫战斗员，伙夫叫炊事员，马夫叫饲养员，人人互相都叫同志，官兵一律平等、军民关系融洽，这一点最令人满意，我们议论得也最多。但是，在艰苦的敌后战争岁月，行军、作战、反扫荡，驻地分散，不断转移，聚晤的机会并不多。抗日战

争胜利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联成一片，成为拥有80多个县，二千四百万人口的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陆续迁入平汉线上的邯郸市（后迁入武安）。师政治部变为大军区政治部，我由部队转入地方，在新华社和报社当记者，备耕仍在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邯郸城市不大，我们聚晤机会多了。解放战争开始，我到冀鲁豫前线随军采访一年，我回来时，他又到前方去了。后来我转到太原前线采访，1949年太原解放后就被留在山西工作，此后一直未动。备耕同志则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忽而淮海、忽而渡江、忽而南京、忽而上海、忽而重庆，终于失去了联系，然而还是互相惦记着，也从一些老熟人那里间接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晚年离休，才又在北京重逢，才知道都住在北京。彼此都成了老人，虽然同住一个城市，见面还是不易，但每次聚晤都有无比的欢欣，益感战争岁月中结下的友谊无比珍贵。我约略知道，他离开部队比较迟，离开后和部队宣传部们仍有联系，协助整理过许多重要资料，编辑过好几本书，撰写过不少研究性的文章，得过奖。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他的勤奋，他的执着，常常对我是重大的激励。最近，他又给了我这两摞打印稿，就是《刘伯承的哲学思想》和《人民是母亲》这两本书。

战争胜利之后，我们这些在129师战斗过、工作过的人重逢，总是特别高兴，自称并互称“刘邓的老兵”，甚至“幸存的刘邓老兵”。当此际会，我常有点不安，因为我在

129 师时间很短,没有扛过枪打仗不说,连参谋之类的军事职务也没有挨过边,能算什么老兵。但是备耕同志不同,他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几乎都在刘邓身边或身边不远,对刘邓有许多近距离的接触、观察和感受,此后在和平岁月中又下功夫整理资料、系统回顾、分析研究,我一篇一篇读着这两本书,不禁油然而生一个感想:这两本书应称为刘邓老兵回忆刘邓、评论刘邓的书,不仅于年轻人大有裨益,就是我这不合格的老兵,也得到不少重温往事的欢愉,领悟到不少当时经历了但不理解、也未特别珍惜的东西。

(二)

红军时代朱毛并称。红四方面军在抗日战争初改编为八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1938 年到职)并称刘邓。后来不足万人的 129 师发展为 30 万人的“刘邓大军”,又发展为威名赫赫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委仍然是他们俩,仍然并称刘邓。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一直并肩作战的这两位战友,互尊互敬,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全军称之为刘邓首长。一位老兵说,刘邓首长是两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中间不需要顿号。他们一个高大魁梧,一个短小精干,各有各的巨大人格魅力,而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形成吸引全军的磁石,统帅全军的旗帜。对刘邓首长,如果单独见到,对邓称政委或邓政委,也只能有这一个称呼;对刘则不称司令员而

称师长或刘师长。我听到不少 129 师的老兵都这么说。为什么呢？从备耕同志这本书中，我领悟到，刘邓属下对刘邓首长内心同样崇敬、钦服，但邓锐敏果断，令人无不敬畏；刘和蔼慈祥，使人倍感亲切。该称司令员而仍称师长，不是因为老习惯，而是尊之亲之为老师、长辈。当然这是个严谨的老师 and 长辈。1946 年秋，刘邓大军在冀鲁豫战场五战五捷，蒋军气急败坏，老羞成怒，不断造谣说刘伯承将军负伤、逃遁、战死。十一月初，中央社又一次造这谣，延安新华总社指示前线记者团，派人访问刘司令员，予以批驳。团长齐语下部队了，方德和我在指挥部，感到任务重大紧急，商量晚饭后便直接到作战室那个院去找刘司令员。他因为连续组织战役，日夜操劳，眼疾复发。警卫员引我们进屋的时候，医生正让他躺在床上给他上眼药。我们说明来意，他用手示意我们坐下，躺在床上笑着说：“谁知道我已经死了几回？这些无聊的谣言本来可以不去理它，既然总社有指示，从政治上考虑有必要，那就得当回事来研究。”他让我们把电报重念了一遍，又伸手要去并从床上欠身起来，经医生和我们再三劝阻，才斜靠着床背同我们研究稿件的写法。他先征求我们意见，又提出另一个设想供我们选择。他的谦和、亲切使我们如沐春风，毫无局促不安之感。正在这时，邓政委进屋来了。刘司令员说：“好了，邓政委来了，听他的吧！”邓政委问明了情况，没有吭声，用右手扶着含在嘴里的烟斗，在屋里来回踱步。过了三四分钟，他说话了：“我看就这

样吧！”接着便口授了一篇电讯，针对谣言着重描绘了刘将军在墙上军用地图前运筹帷幄的神态，“他对中央社的谣言笑而置之，不屑一顾，继续用电话指挥部队。据指挥部某权威人士称，他正在创造一惊人战果。”邓政委真是敏捷明快，举重若轻，一句接着一句，不紧不慢，干净利索，毫无停顿、重复，简直像在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稿。我们赶紧快速笔录，回来稍加整理连夜发往总社。一项紧急重大的采访任务，想不到在刘邓首长直接参与下迅速圆满完成了。我们深深体会到刘邓首长性格、风度如此迥然不同，却又能如此浑然一体，克敌致胜。当时正是滑县战役前夕，果然三四天后，蒋军一零四旅全部、一零五旅大部共一万余人又悉数被歼。

刘伯承早年从军，后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红军时代任总参谋长，是一位全国著名的军事家。抗战后129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他指挥下打了一个又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胜仗，被人们誉为“常胜将军”，我们亲历过一些战役的更是心悦诚服地认为他指挥灵活巧妙。可是他为什么有这么高明的指挥艺术？却很少去深思。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答案，最重要的是思想——军事战略战术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军事哲学思想。

“五行（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刘伯承将军经常告诫部下的一句话，只有十个字，指出了作战前调查研究决定胜败的重要性和必需调查清楚各个项目，特别要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和利用

敌人的特点。刘师长要求部下,不仅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只有准确地研究敌人的特点,才能准确掌握战争的规律性,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在各种情况下机动作战。刘伯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翻译过恩格斯《反杜林论》有关军事部分的章节,其中强调指出:“自由不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但是,要在军事领域认识并运用客观规律,就比别的方面更加困难。因为“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像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像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所以很难避免不犯错误,要严谨严谨再严谨,审慎审慎再审慎。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他坚持每战必须掌握准确情况,再下决心,也要求部下必须如此做。如果指挥员道听途说,不亲自去看地形,掌握情况不具体不准确,一定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同志,粗枝大叶是要害死人的!”他不能容忍那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报告,辛辣地讽刺其为“山西圆毡帽”,前后不用分,正反随便戴。

刘伯承这种严谨审慎、一丝不苟的作风,贯彻了他作为司令员的每一次作战行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部队,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因此部队在战争中才得以不断扩大,愈战愈强。常胜将军并不是任何一次作战行动都没有任何疏失,而在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作战行动中

的任何一点疏失，都要检查，都要总结。他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道路，不断把实践经验提高到军事科学理论上来认识；又不断用实践检验自己所学的东西，使之不断发扬、不断提高，以战胜敌人。他掌握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真谛，成为备受赞誉、爱戴、推崇的常胜将军。读者只要一篇一篇读下去，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三)

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凡教育家首先必定自己是个博学深思的人。书中不少篇章写到这个方面感人的事迹，并引了邓政委早在1943年写的一段话：“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仅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群众去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戎马倥偬，不断在行军作战中生活，在他简单的行囊中，必定少不了书，各种图书文件常堆满案头，特别是那一部《合同战术》，几乎无日不在身边，一有空隙就阅读译著。他博览群书，很留意国际军事思想动向，连美国教授介绍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所使用的恐怖战术的油印小册子也不放过，要当时师部出的内部刊物上摘要转载，因为日军也有类似战术，他要让干部“开开眼界，见多识广一些。”他多次向全军推荐《兵士兼统帅》这本介绍苏渥洛夫的著作。他说，苏渥洛夫的观点

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主张打歼灭战，主动的进攻战术，军人要有高度的争取为人民建立战功的荣誉感，指挥员要善于用思想和善于学习经验，要以身作则和坚持严格的军纪等等，我们都要好好学习研究。他特别强调苏渥洛夫的一句名言：“脚是决定胜利的基本条件，而手不过是争取胜利的工具”，已成为全军上下的座右铭，解放战争初期冀鲁豫战场上 100 天内歼灭敌十一个旅的有生力量和后来许多更辉煌的战绩，就是“大踏步进退”，机动灵活打歼灭战的结果，证明了脚的无比威力。

129 师成立以后，明确规定了每次战斗后必做军事和政治总结的制度，而且始终坚持不懈。其实，早在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就写过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红军时期他一直这样做，后来到 129 师更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对部属也同样要求。他一贯重视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或一个大兵团、一个军、一个师、旅甚至一个团、营、连以及某一个战斗英雄和神枪手的实战经验，做总结就是向他们学习，把分散的部分的经验集中起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使其上升为理论，及时指导作战。

1942 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年。日寇侵略军为疯狂报复百团大战所受的挫折，实行所谓“驻晋日军总进攻”，春、夏、秋三次对太行区进行共计 108 天的大规模扫荡，特别是五、六月份毁灭性的铁壁合围，出动兵力 2.5 万人，交战长达 55 天，对我统帅机关实行远距

离扑捉奇袭、反复奔袭，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用了一切残酷狠毒狡猾的手段，甚至把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师部首长的肖像印成折子随身携带。于是，合击和跳出合击，便成了双方指挥官斗智的焦点。刘伯承没有低估敌军和整个形势的严峻，从多方面作了最切实的准备，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大智大勇的革命气概在铁壁合围中寻找缝隙，创造并利用了敌军的弱点，跳出合击圈夺取主动权，终于粉碎了这次空前的大扫荡，一些随师部行动的党政领导对他的指挥艺术感佩不已，认为当得起是“胆大包天，细心如发，守口如瓶。”战后他又不顾疲劳，及时写出总结。这份1.2万字的《五月反扫荡总结》是刘伯承军事学术论文中具有理论深刻性、系统性的代表作之一。戎伍胜（边区政府副主席）誉之为太行山的《论持久战》，大大鼓舞了士气民心，成为对付侵略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中关于敌后武工队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论述，在已往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实现了再一次的“敌进我进”，更全面的“全民皆兵”，“透入敌人封锁线的后方，在其外强中干的痛痒处开展釜底抽薪式的游击战争”，从而有效地制止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吞食，使缩小了的抗日区重新恢复和扩大，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冲出了一条摆脱严峻形势的道路。后来陆定一曾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武工队是一个创造，是好的，有功绩的。”

刘伯承强调部队教育的重心是对干部的教育。为使

各旅的轮训队提高质量,他亲自办起了师轮训队,“培养教育的干部”。他把写军事课本当作“严重的战斗任务”,亲自参加写作和编审。他不辞劳苦,担起了作战和教学两副重担,精心培养提高指挥员的素质,使作战和教学同步发展。他还让各旅办青年队、地训队,学军事、政治更学文化,作为进入相持阶段准备反攻的实际步骤,这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刘伯承阅历丰富,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也是位语言艺术的大师。他讲话、做报告生动幽默,一些妙趣横生的民间谚语常常脱口而出,使人易于理解,久久难忘。比如分析日军兵力少防线宽的致命弱点,就说“用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到处防守,到处是弱点。”敌后抗战就是充分利用敌人这一弱点,打了许多胜仗。在刘伯承指挥下作战的干部个个心明眼亮,知道首长的决心和战术要求,因为他总是用简明而形象化的语言把任务交代得清清楚楚。比如上党战役用的是“三个老虎爪”围城打援的战术,冀南纵队包围长治,佯做攻城状,太行太岳两个纵队东西夹击来援之敌。一切布置就绪,他电话上对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说:长治是块硬骨头,先不要啃它。先吃眼前来增援的这块大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岭,已经按住了敌人的大腿,你赶快从中间大道往北插,直捣敌人的腹心。敌援已陷入我四面包围,很快要发动总攻,你快准备出击。”闫军总兵力 3.5 万人,超过了我军,结果几乎

全军覆没，总指挥史泽波以下 24 个将领全被活捉。这就是著名的钳形攻势，袋形攻势，广大指战员普遍心领神会。“五行”古来指金、木、水、火、土，普通老百姓都懂的。他用了个谐音，造出一句“五心（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借此说明每次作战，首先必须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方面弄清楚，指挥员才能下决心，这个形象化的说法很快为部队上下所接受。“五行”变为作战指挥的守则，真是刘伯承的神来之笔。这不过几个例子，其它如“死猪不怕开水烫”、“狗改不了吃屎”、“牛打架只会用犄角，不如马更不如狼”、“窄路相逢勇者胜”、“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等，不胜枚举。129 师老兵，大多耳熟能详。最后这两句话，邓小平巧妙地用于重大方针政策地诠释，在改革开放中起了出人意料的巨大作用，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语言。

（四）

正确处理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刘邓共同关注的最根本问题。1941 年 12 月 6 日，刘伯承 50 岁，师部总部都要为他做生日，他都辞谢了。他说：“我很荣幸地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找到了正确英明的领导者，并且能够和群众在一起，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进行群众的解放事业。”他郑重地写下了一句朴素的话：“勉作布尔塞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在一起！”据备耕同志了解，刘师长这一手迹，因为当

时太行山没有制版条件,是用木刻制成的。

邓小平当时发表了一篇祝寿的文章,其中写道:“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掠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拿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出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的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一生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刘伯承经常说:“毛主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政治工作是前提,士气不高什么仗也打不赢”“革命战争离不开政治工作,就像厨子做饭,离不开火”。

1943年1月,邓小平作《五年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提出一个警句:“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一旦被广大革命者掌握,就可产生克敌制胜的巨大力量。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晋冀鲁豫军区首脑机关进驻邯郸(后迁入武安),邓政委为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人民的军队》题词:“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

民利益着想。”

1947年初老区十多万翻身农民参军到前线，刘伯承感慨地说：“带领这样的战士，不打胜仗的话，真正惭愧！”

对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群众纪律、军风军纪这些方面，刘邓共同的高度关注，一致的深刻共识、真诚的炽烈感情，不能不使人再次联想起那句话：刘邓是两个人，也是一个人，中间不需要顿号。

1946年夏，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定，秘密下令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刘邓大军分路奔赴晋鲁豫前线。七月的一天下午，总指挥部到达濮阳县城，在天主教堂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许多人都是从几十里外骑马赶来的，大家席地而坐，挤满了各个角落和楼梯，全神贯注地听刘邓首长做形势报告，传达中央军委关于纪律问题的指示。刘伯承最后着重说：“你们是带部队作战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关键就在你们身上。一个部队纪律的好坏，首先要看直属队和直属人员，特别要看首长的警卫员。”这几句话，像一根大棒敲响了大钟，以致几个月后我到部队采访，还有些同志和我谈起当时所受的震撼和回部队如何整顿纪律的事情。

会后第二天早晨后出发，我们记者团随政治部已快走到城边，突然又被叫回来，到刘邓住的那个院子里列队集合。这一非常的举动使人惊奇，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悄悄互相打听。原来出发时大车又多了，刘邓首长发现后立即追查处理，下令退回，并派人把先走的人统统叫了回